

## 中国基督教合一的历史进程(续)<sup>[1]</sup>

段琦

### 二、新中国成立后 50 年代的教会大联合

如果我们把上世纪 20 年代发起的本色化运动视为中国基督教会的第一次合一运动,那么新中国成立后 50 年代在三自爱国运动影响下于 1958 年实现的教派大联合就可以视为第二次合一运动。这次合一运动与 20 年代的不同之处是,它是在前一次合一运动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元素,特别是政治因素。

#### 1.50 年代三自爱国运动及教会大联合

(1) 三自革新(爱国)运动及三自爱国委员会,部分取代了原有的基督教协进会的功能

中国基督教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在寻求本色化,但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始终是个“洋教”。新中国成立前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教会中许多人对共产党和新中国抱有抵触情绪。而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当然不会允许一个与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基督教会存在。因此,切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实现“三自”也就成为中国基督教会顺应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举措。中国基督教如何能在这种条件下求生存?唯一的道路是走“三自”之路。

在周总理的启发之下,吴耀宗等 40 名教会领袖于 1950 年 7 月

---

[1] 编者注:本文第一部分已经在《金陵神学志》2019 年第 2 期登载。

底向全国基督徒发出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简称《三自宣言》),提出了教会革新的总任务、基本方针和具体办法,拉开了三自革新(爱国)运动的帷幕。此后,全国各地基督徒都热烈响应。

1950年10月,中国基督教协进会在政府的支持下召开了一个完全由中国信徒主持及参加的第14届年会,成为有史以来中国基督教协进会首次无一外国传教士参加的年会。全国基督教各教会团体都派代表参加,包括来宾共有140人,这也是历届基督教协进会年会中参加的宗派和教派最多的一次会议。该会议的主题是“基督的福音与今日的教会”,着重讨论了教会如何实现三自以及协进会本身改革的问题,确定了在五年内完成自治、自养、自传的任务,彻底割断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会议还增选了吴耀宗等人为协进会领导成员。

1950年12月,因抗美援朝,美国冻结在美的中国财产,受影响最大的是依赖美国津贴的教会团体和教会学校、医院等。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采取相对应的政策。美国用停止经济来源试图迫使中国教会屈服的行径激起了广大基督徒的愤怒,他们支持中国政府所采取的相应政策,更加认清了西方差会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由此更积极地投入三自爱国运动。从1951年起,许多基督教团体不仅宣布不接受美国的津贴,而且宣布不接受任何外国任何方式的津贴。在这年初的第一个星期就有1万多人签名响应三自革新宣言。

美国的这一行动,迫使中国基督教会提前实行自养。人民政府为帮助中国基督教会解决这一困难,于1951年4月召开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政府宣布免收城市中教会的房地产税,以帮助教会渡过难关。这也更坚定了中国基督徒走三自道路的决心。会议通过了《中国基督教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号召基督徒永远割断与西方差会的联系,实现三自,热烈拥护抗美援朝运动等等,并组建了“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吴耀宗任主席。不久,在该委员会的领导下,教会发起了控诉美帝国主义和美国传教士的运动,使信徒进一步认清了传教士与帝

国主义的关系,并更坚定了爱国立场。1954年7月,由于形势的发展,中国基督教会召开了全国会议,在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吴耀宗仍当选为主席。从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建立过程可以看出,该组织的成立过程实际上就是取代了新中国成立前基督教协进会的作用。不仅如此,它在某种程度上比协进会的作用更大,因为它是得到政府支持的,是与国外一切差会切断联系的。

笔者从口述史中了解到,从1950年发起三自运动起至1951年组建三自筹委会,再到1954年正式成立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这几年期间,三自组织也经历了从分散到集中的过程,即先是由各教派的分散的三自组织再发展到统一的三自组织的过程。三自爱国会一经统一,便经常把各教派主要领袖聚在一起开会进行政治学习,由此各宗派教会领袖之间建立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密切的联系,增进了互相的认知和了解,大大消除了各宗派之间的成见,客观上为日后的教会联合做了铺垫工作。

## (2) 神学院的合并<sup>[2]</sup>

中国教会在与西方差会断绝经济联系之后,对中国神学院影响非常大,因为新中国成立前这些神学院都要依靠差会资助,而且神学院师资队伍中传教士占了很大的比例,他们的撤离对神学教育影响相当大。更主要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宗教的负面看法,造成没人愿意读神学,神学院原有的学生也大量流失的现象。因此面临着师资力量、生员、经济上三者的严重匮乏,唯有合并才是出路。当时正值社会上的大学也在进行院系调整,由此各神学院也顺理成章地进行了调整,实行了联合办学。

合办的神学院主要是三个,一个是金陵协和神学院,以金陵神学院(包括金陵女子神学院)为基地,把华东地区的其他10个神学院归入其中。1962年,燕京协和神学院又并入金陵协和神学院。

---

[2] 参见顾梦飞:“中国基督教联合礼拜”,北京大学宗教学系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未发表)。

一个是燕京协和神学院, 1953年以原来的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为基础, 把北京神学院和联合女子圣道学院归入其间。到1956年, 陆续参加联合的神学院达到了11个。

一个是重庆神学院, 对象是西南各教派的神学生。

中国神学院从神学思想上可分为以现代派为主和以基要派为主两类神学体系。在神学院联合之后必须考虑到这种情况, 由此一些神学院, 如金陵便分设两套课程, 一套针对现代派学生, 一套针对基要派学生。老师也是分为两派, 现代派和基要派。学生们任选一种课程。从总体而言, 当时各神学院的师生都能相互尊重, 体现了合一精神。

(3) 50年代中后期极“左”路线的影响, 使教会不得不联合

A. 新中国成立后信徒的急剧减少。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新中国成立后对宗教的看法有着密切关系。对这一点, 吴耀宗的认识是较早的, 他在1950年就说: “基督教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 是目前基督教对外关系的最主要的问题, 也是基督教在新中国成立后所以遭遇困难的最重要的因素”, “基督教是洋教, 是帝国主义的工具; 基督教是迷信的, 反科学的, 是人民的鸦片。这是一般人, 尤其是受过唯物主义教育的人, 对于基督教的看法。”<sup>[3]</sup> 这种看法使宗教信仰徒在人们眼中被视为落后分子, 再加上各种运动, 使许多青年信徒纷纷退出基督教。

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学习极多, 加班加点是常事, 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 全民大炼钢铁等, 即使没有退教的信徒也很少有时间参加教会活动。

信徒的大量减少使一些教会门可罗雀, 也直接影响到教会的奉献。许多教会日常的水电费正常开支都交不起, 更不要说教牧人员的工资了。

B. 对宗教的看法也直接影响到对教职人员成分如何划定的问题。

---

[3] 吴耀宗: “展开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旗帜”, 载于《天风》, 1951年1月30日。

新中国成立初人们普遍把教职人员视为搞封建迷信者，对他们的工作抱有很大的偏见，因此必须要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57年下半年到1958年，全国各地教牧人员普遍集中进行社会主义学习，其中一个重要论题就是教牧人员是否属于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经过这场学习之后，一大批在教会的工作人员都被分配去工厂或下放到农场。上海教会有一批人下到钟表厂、木器厂等等。北京一批教职人员则下放到东郊农场等地劳动。

不仅如此，在“反右”时把一大批教牧人员打成了“右派”，北京一共一百多个教牧人员，打成“右派”的就有四十多个，达到三分之一，一批主要的教职人员都被打成“右派”，送往南园农场劳动。教会上层中陈崇桂被打成“右派”；就连吴耀宗，若不是周总理保他，也难逃此劫。

C.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教会也变得越来越“左”。在学习中，许多地方提出了整顿教会，消除教会混乱现象，以纯洁教会。<sup>[4]</sup>

为纯洁教会，各地教会对信徒的资格进行了限制，如沈阳教会在施洗之前，对“每个要求领洗的人的政治状况进行详细考察，不让一个坏分子钻到教会来”。<sup>[5]</sup> 中华基督教会东北大会辽南区会规定，不吸收成分不好、对社会主义不满和各种犯罪分子作信徒。贵州教会决定，不吸收政治面貌不清的人参加教会。同时，对教会人事进行调整，改选执事会；江苏基督教要求“对教会组织和人事进行整顿，从而改变那些由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右派’分子、坏分子、自由传道和一切制造混乱现象的人把持、利用教会的情况。”<sup>[6]</sup> 对于教会事工，各地教会也要求做到不医病赶鬼，不唱消极、悲观、厌世的诗歌，不做含有消极、悲观、厌世等毒素的见证，教牧人员讲道要结合政治，

[4] 参见顾梦飞：“中国基督教联合礼拜”（未发表）。

[5] “沈阳市同道订出爱国运动跃进决心书”，《天风》总 549 号，1958 年 3 月 31 日。

[6] “江苏省基督教三自爱国代表会议关于消灭混乱现象和一切非法违法活动的倡议书”，《天风》总 553 号，1958 年 6 月 2 日。

不接待自由传道,彻底肃清混乱现象。沈阳市甚至把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改名为基督教安息日会,以避免“坏分子利用‘复临’二字来造谣”。各教会的牧师讲道也越来越政治化,因此造成教会信徒进一步流失。

信徒大批流失,教牧人员和工作人员大批下放,很多教堂周日没有什么信徒,上海多数教会聚会人数只有数十人,北京一个信徒也没有的教会就有十几处,信徒人数 20 人以下的有二十几处,全市经常参加礼拜的信徒不足 500 人。<sup>[7]</sup> 教会经济困难愈发严峻,空留大量房屋仍需要维护和交契税,还有需要教会负担的闲置下来的教牧人员,这使得大多数教会在经济上已不堪重负,甚至难以为继了。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合并,举行联合礼拜就成为最好的选择了。

#### (4) 教会大联合<sup>[8]</sup>

上述种种原因最终导致教会的联合。1958 年,春夏季的《天风》杂志上,已经陆续刊出“宗派应否原封不动”、“宗派应适当的变动”、“在上海的各教会总机构可以联合办公”等读者来信,提出教会联合的设想,以节省人力物力,支持教会其它事工或社会主义建设。

宁波、温州等地三自爱国会及一些教派在此时就有所行动。从 1958 年 3 月起,宁波三自爱国会提出“将现有的布道所、家庭聚会的活动合并在各教会内”,<sup>[9]</sup>不久又倡议进行教堂合并,把一些信徒少的教堂并入邻堂,对教职人员进行统筹安排等,得到了各教会的响应。宁波全市基督教堂点从 271 处并至 20 余处,市区从 24 处并为 4 处,后又再次合并为 1 处。<sup>[10]</sup>

1958 年 4 月,循道公会温州教区乐东联区决定把五里路以内的教堂进行合并;减少主日义工派出次数等。镇海县的 26 个堂所,也按地区联合起来。<sup>[11]</sup>

[7] 沈德溶:《在三自工作五十年》,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00 年,第 43 页。

[8] 此节部分内容参考顾梦飞:“中国基督教联合礼拜”(未发表)

[9] “在政治、思想、生产上的跃进规划”,《天风》总 549 号,1958 年 3 月 31 日。

[10] 徐物成:“基督教在宁波的轨迹”,《宗教》总 18 期,第 107 页。

[11] 蔡文浩:“浙江教会在前进中”,《天风》总 558 号,1958 年 8 月 11 日。

5月,温州教会决定合并,对合并后的教会组织、事工、制度等都作出了具体的安排:取消原来宗派名称;统一人事、经济、组织形式;合并后教会的地点以地区适中为原则;在信仰上互相尊重,洗礼、浸礼、蒙头、守安息日均自由;圣餐每月一次,主张用多杯。经过筹备,温州教会于7月的第一个主日开始联合礼拜。<sup>[12]</sup>

全国三自爱国会看到这一情景,因势利导将教派问题提升到政治高度去认识。例如七八月份,《天风》接连刊出“谈谈宗派问题”和“彻底改变中国基督教的半殖民地面貌”两文,指出宗派问题“不是一个信仰问题,是一个认识问题”,“这些制度和礼仪,总的目的是为资本主义利益和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不利于基督教向社会主义跃进,“今天,应该是结束帝国主义所造成的四分五裂的局面的时候了。”<sup>[13]</sup>

这样就吧一个因各种实际困难进行教会联合的行为,变成了一个政治考量。这一层因素,更助推了全国多数省市教会实施联合。除了福建进行宗派内的联合以外,其他各省市都进行了打破宗派界线的大联合。

继宁波、温州之后,北京和上海教会也都相继合并。北京教会从1957年冬到1958年7月教牧同工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三分之一的人打成了“右派”,之后学习班结束。大家表示不再吃剥削饭,于是把没戴“右派”帽子的传道人和神学生,分到东郊农场劳动;把“右派”分子分到南园农场劳动。但都劳动去了,那信徒怎么办?经讨论决定留四个堂,东西南北城各一个:米市堂、珠市口堂、缸瓦市堂、宽街堂。北京当时共有65座教堂,留下这4个堂,其余的61处教堂都捐给国家,其中有几个堂直接交给了学校,如崇文门堂直接交给127中,灯市口堂交给25中,其余的都交给房管局。各教堂的东西大多不要了。教牧同工中留下少数人负责四个堂的教牧工作以及合

---

[12] “温州教会实行合并”,《天风》总559号,1958年8月25日。

[13] 《天风》总559号,1958/8/25,转引自顾梦飞:“中国基督教联合礼拜”(未发表)。

并后登记之类的工作，其余的都下农场劳动。

上海的情况与北京不太一样。上海市基督教社会主义教育委员会继而于8月12、13、15日连续三天举行了有一千多人参加的上海市基督教工作人员及信徒代表会议。会议决定由各区成立联合礼拜筹备委员会，以区为范围实行联合礼拜。会议后，各区联合礼拜筹备委员会对于联合的地点和联合后的事项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和协商，解决“别人并进来”的自满心理和“我们并出去”的自卑心理；联合礼拜的场所，都选择较大和条件较好的教堂；对于不同的仪式、习惯，有的如大哭大闹等不符合社会主义利益的，要求完全改变，有的则适当照顾安排，在彼此尊重的原则下，统筹安排；另外，决定对联合后部分教堂改变堂名，统一人事、经济。<sup>[14]</sup>

经过数周的筹备，9月7日，上海各区的联合礼拜正式举行，上海市大大小小208个教堂，合并成22个，留下74位教职人员。1965年礼拜堂再次合并至11个。<sup>[15]</sup>

这些多余下来的教牧同工在1959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束之后都转业了，分别分到木器二厂（后改名红木雕刻厂）、灯具厂、羊毛衫厂、钟表厂，年老体弱的则组织贴纸盒（根据口述史资料）。

1958年夏秋，大理、沈阳、南昌、哈尔滨、天津、营口、南京、杭州、贵阳、扬州等大、中城市纷纷进行了教堂合并和联合礼拜。到1958年年底，全国各地的教会基本都走上了联合的道路。<sup>[16]</sup>

上述联合举措是多种因素促成的。首先中国文化的影响，教会的宗派意识不是太强，所以容易走联合之路；二是三自爱国运动促使各教会领袖之间加强了相互联系和交流，也容易打破教派间的成见；三是因教会信徒大量流失、经济难以维系等等不得不走合并之路；四是政治助推，把宗派视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留下的产物，要与之划

[14] 参见顾梦飞：“中国基督教联合礼拜”（未发表）。

[15] 《上海宗教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546页。

[16] 沈德溶：《在三自工作五十年》，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00年，第44页。



清界限。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合并举措匆忙急促,完全是运动式的合并,缺乏各宗派之间从仪礼到神学思想的仔细探讨,最后达成一致的过程。而且在当时形势下,把教会房产轻易地捐献出去也为日后恢复教会事工带来极大的麻烦。尽管如此,中国教会走出的这一步是世界其他教会所未能实现的。从这一点看,它对世界基督教合一运动是做出了贡献的。

## 2. “文化大革命”期间至80年代初的中国教会合一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六届、中国基督教协会第四届全体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2000年9月22日一致通过的《爱国爱教,同心迈向新世纪——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五十年的总结》将三自爱国运动分为三个阶段:“1950-1966年是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反帝爱国,摆脱外国差会控制,收回教会主权,中国基督徒自办教会,实现自治、自养、自传。1966-1978年因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基督教事工被迫停顿。1979-1998年是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坚持‘三自’方向,从自办教会到办好教会,即治好、养好、传好。1998年底,济南会议决定‘加强神学思想建设’,是第三阶段的起始。这是三个既有区别,又互相连贯的阶段,每一阶段既有其主要任务,又是前一阶段的继续、深化和充实。”<sup>[17]</sup>

这种划分如作为三自爱国运动的历史而言是可以的,但作为中国基督教会的历史,包括中国基督教合一运动的历史就显得不足了,“文革”时期的教会史是非常重要的,不能用“基督教事工被迫停顿”这几个字就把这段历史一笔勾销。中国教会目前对这段历史没有做过系统整理,笔者只能根据近年来采访所得的口述史料来探讨此段历史。

据笔者了解,总体而言,中国基督教在这一时期完全处于地下

---

[17] “爱国爱教,同心迈向新世纪——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五十年的总结”,《天风》2000年第10期,第10页。

发展,信徒聚会经常受到民兵的冲击,一些教会领袖被捕是常事,《圣经》也是一本难求,国外组织偷运圣经经常被海关截获。但正是这种政治环境使各宗派的信徒彻底去除了宗派观念,达到了空前团结的局面,也可以说是这一时期促成了中国教会的真正合一。其顶峰是“文革”刚结束不久的80年代初。一位家庭教会的牧者告诉笔者:“温州共搞过两次教派大联合。第一次是1958年,那时有官方背景,政府支持搞的,人们虽然组织上联合了,但教派意识还都存在。第二次是在1980年至1982年,这次联合是信徒自发的,彻底地打破了宗派观念。这次联合很彻底,讲道都统一派单,因为这是建立在‘文革’、‘无宗教’区的背景上。‘文革’期间搞‘无宗教区’,所有的信徒都转入了地下,人们的宗派观念都给彻底打掉了。”

1980年代初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大联合,确如上述牧师所说的那样,是建立在“文革”消灭宗教的基础上的。据笔者近些年来对温州教会的调研,几乎所有访谈对象,不论是三自爱国系统下的教会,还是家庭自设聚会点教会的信徒和牧师都谈到“文革”时期温州搞“无宗教区”的极“左”路线,结果却对教会合一产生了极佳的效果,因为信徒在当时全部转入地下,彻底地打破了原宗派的界线。

一位家庭自设聚会点的牧师很生动地告诉我当时他们的聚会情况。他说:“那时信徒只能在小家庭里聚会,又没有讲道人,有病了就请人祷告。我公公是位很虔诚的信徒,有祷告的恩赐,有人病了就请他去祷告,经祷告病就好了,信的人就更多了。聚会人多,要唱诗,又不能被人发现,于是就都偷偷地去山上聚会。因为山上只有几户人家,那几户都是信主的,到那里聚会就很保险。这样就形成了几个祷告山,这些祷告山有些在水库顶上,有些在山里头。一些山下的人听说要来抓他们了,他们就跑到祷告山上去。较有名的是天堂山,那里有老房子,就是天堂教会。在山上聚会,一旦有人去抓的话逃起来方便。”

一位三自爱国会系统的牧师告诉我:“‘文革’时搞‘无宗教区’,不允许聚会,但义工起来在家庭搞聚会。一些人一大早就来到某信徒

家中聚会,这种聚会在城市中很多地方都有。也有是晚上聚会的。但有些被邻居举报了,便受到打击。以后就改到郊区去聚会,天明之前赶到聚会地点,晚上十点才散会。那时还有青年培灵会,一开就是一两天。这些聚会一般都是在福音村举行。这些福音村往往是在山头上,几户人家均是基督徒,到那里聚会就无人干涉了。在那里聚会的往往有一两百人,那时大家都非常热心,还请一些名牧来讲道。当时有一位名叫林乃梅的,讲道很好,是贫农出身。他为此而被捕数次,但每抓一次,他的威信就提高一级,成为义工出身的教会领袖。我们那时把这种聚会都叫交通会。”

另有一位家庭自设聚会点的牧师也告诉我同样的故事:“‘文革’期间温州实现‘无宗教区’,信徒在家偷偷聚会。69年圣灵藉着林乃梅弟兄带领信徒偷偷地在晚上聚会。当时圣灵有许多带领,刚开始是让人认罪悔改。当时聚会都在半夜二至三点,四点半前要结束,否则会被民兵发现。70年代初2-3月时就有人受洗,当时还开办了主日学,但不久就受到严厉的打击,乃梅被抓,罗先生因祷告被判8年,还有被判5年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人退缩了,不敢再聚会了,但更多的人则更坚强了。这些人被抓起来办学习班,有些人被判3年。70年代中期,温州基督教从城市开始发展,这点与其他地区不同,其他地区都是从农村开始的。温州信徒单纯、热情,都不怕苦,他们在城市接待从其他地区来的信徒,他们愿意作见证,有受苦的心志,由此带来温州教会的复兴。改革开放初期,80年代建堂,86年开始办主日学。主日学的教材都是从香港、台湾等地引进。”

他们还谈到,“文革”时期,牧师受到严密的监视,因此都不敢出来。到80年代牧师们陆续出来在三自教会当负责人了,这就产生与义工领袖的矛盾。他们称牧师为“缩头乌龟”。在“文革”时都只知保命。其中有的还撕《圣经》,说耶稣是私生子。这样的牧师在信徒中便失去了威信。

另一个省份一些信徒也谈到“文革”期间家庭教会聚会的情况。他们也都在夜深人静时在旷野聚会,所宣讲的内容是“天国近了,你

们要悔改！信耶稣，灵魂上天堂，不信耶稣，灵魂下地狱。信主不怕坐监批斗，为福音坐监，在天堂里赏赐更大。背十字架跟随耶稣受苦，将来得荣耀。”“传道受批斗时要喜乐，因为将来在天堂得喜乐的冠冕”，唱的灵歌主要是《打魔鬼歌》、《为主殉道歌》之类的，以振奋人心，鼓励人们不怕被捕。当时传道人 and 信徒都冒着随时被民兵抓捕的危险去聚会，有相当一批传道人都有数次被捕的经历，例如张荣亮等人。当时的基督徒，到处见证神迹奇事，赶鬼医病，病得医治的信息，一个村子只要有人通过祷告治病好了，该村的信徒就自然会增加。

一位聚会处的长老对我说，“文革”时期，教牧人员都不敢出来了，全靠平信徒起来做工。当时基督徒虽然不敢公开，但相互之间遇到，不分什么教派，都会倍感亲切。

我们从这些访谈中可以发现当时是在高压形势下，所以聚会都是在家庭或山上、或旷野，根本没有什么教堂。这些聚会都是由义工凭信心发起。聚会时，几乎没有《圣经》，祷告、唱诗、作见证是极其重要的内容，还包括医病赶鬼、行神迹奇事。他们也会请一些“名牧”来讲道，这些所谓的名牧，大多数是从义工中兴起的一批传道人，这些人信仰虔诚，冒着随时被捕的危险宣讲基督教的道。他们所讲的道简单明了，要人悔改，信者进天堂，不信者下地狱，没有高深的神学。一些多次被捕对信仰坚定的领袖成为当时各家庭自设聚会点都公认的领袖。这种组织形态与新约时期的教会形态十分相似。用梁家麟的话说，就是“复原主义”的形态。

这种组织形式和传道内容对弱势群体极有吸引力，这点也与初期教会一样。一位牧者告诉笔者：“事实上那时被鬼附的人很多，治愈后就信耶稣了，那时因病信教的人很多，人们都认为穷人信耶稣，因为病祷告好了就信了。所以基督教在穷人、病人中发展很快。那时信徒有爱心，有人妻子死了，孩子无人带，信了基督，兄弟姐妹就帮着带，所以基督教对穷人、有困难的人都特别有吸引力。但对家境好的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对基督教有看法，都不信。”

上述一些省、区基督教的发展情况可以代表当时全国各地基督教

发展状况。正是文革这一特定时期,造就了一批义工传道人和教会组织者,他们完全打破了原有宗派观念,真正做到合一。当然这种合一是建立在复原主义的基础上,即回到初期教会的形态中去。不过我们也发现,基督教在秘密发展过程中,教会也有逐渐走向完善的趋势,特别是温州教会发展出一套同工会的管理模式,开始有计划地办青年培灵会、主日学等等活动。

“文革”结束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贯彻落实,教会活动逐渐恢复。1979年4月8日,浙江宁波百年堂最早恢复开放(北京米市大街基督教堂早于1972年开放,但当时只允许外国人去聚会,中国信徒不得入内,这主要出于国际关系,尤其是中美建交的考虑)。9月份开始,上海等全国各地教堂陆续恢复礼拜。一些信徒多年没有过宗教生活,内心非常痛苦,如今有了去处,内心激动不已。各地教会很快就出现人满为患的现象,一些大城市的教会不得不周日分几场礼拜。此时的信徒对不同宗派礼仪上的细小差别并不关注,他们看重的是有礼拜可做,有道可听。一些大教会也尽量综合各派之长,淡化本派的特点以适应各类信徒的需要。

而中国农村教会,包括像温州那样的城市教会在“文革”期间发展的信徒原本也无宗派意识,反倒是在“文革”中发展出一套适合本地的非宗派聚会程序和组织形式,如今他们可以完全从地下走到地上,公开地在教堂开展活动了。到80年代初温州教会已发展出一套较为完善的牧区制的同工会管理模式,牧区的各堂点讲道都统一派单。当时的联合完全是自发的。信徒也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可以说80年代初是中国教会合一的顶峰时期,那时没有三自和家庭教会的区别。

### 80年代初至今——“后宗派时期”的中国三自基督教会的合一

#### (1) 中国基督教协会的成立及教会的联合基础

教会恢复活动后,教会事工逐渐恢复,教务工作越来越重,随着信徒的增加,落实教会房产的问题成为各地教会最重要的事。神学教育、《圣经》和圣诗的需求都开始提上议事日程。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后，中国基督教与各国基督教的联系增多，原有的三自爱国会只是一个爱国爱教的群众团体，无法承担起中国教会与其他国家教会对接的任务，由此基督教协会的成立就呼之欲出了。

1980年3月全国“三自”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发表了《告全国主内弟兄姐妹书》，其重点是要重建教会。同年10月召开第三届基督教全国会议，丁光训作了《回顾与展望》的报告，肯定了三自爱国运动的正义性、合理性和必要性，指出“三自”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三自”任务仍未了，提出要“从自办教会到办好教会”。为达到办好教会的目的，会议决定成立爱国基督徒的教务组织——中国基督教协会（简称全国基协）。而全国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则是中国基督徒爱国爱教的组织。这两个组织简称“两会”，互相密切合作，共同为办好我国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而努力。基督教协会的成立也标志着中国基督教会的合一步上了一个新台阶。

对中国教会联合的几个原则，郑建业主教在1982年归纳为七点，即：①原来的各个宗派，都已不再单独标出原宗派的名号而独行其是。②原宗派过去的全国性和地方性组织机构，都在实际上停止了活动和功能。因而，各派都已不再在组织上自成体系。③各派都不独自对国外进行活动。④各派都不单独印发、传抄宗派性的出版物。⑤各派都参加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⑥各派都与参加三自爱国运动的其他各派同心合作，在信仰上求大同、存小异，实行彼此尊重。各派皆不攻击其他派别的信仰和礼仪传统。⑦各派都主张我国教会独立自主，信徒爱国爱教，荣神益人。<sup>[18]</sup> 这表明中国教会的联合的特点就是宗派的外在表现形式，如名称、组织、机构、海外联系、出版机构等都不存在；但在持守基督教基本信仰的前提下，各宗派的某些不同内在理念、信仰观念、礼仪传统等依然保存；也就是组织形式上求同，信仰礼仪上存异，如对于洗礼和圣餐的不同理解和举行方式、对聚会

[18] 郑建业：“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 1950-1992》，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93年，第153页。

时间的不同等等不求划一,对于差异实行彼此尊重,互不攻讦。<sup>[19]</sup>

正是在这一原则下,中国原有的一些小教派除了不挂出他们原有的教派名称之外,其礼仪和信仰观念都保持不变,由此纷纷恢复了原有的教会活动形式。笔者通过访谈了解到,某市于1982年就在此市某教堂副堂恢复了原聚会处的掰饼聚会。同年安息日会也在另一教堂恢复他们的活动。

(2) 体现合一精神的《赞美诗(新编)》和《要道问答》的出版<sup>[20]</sup>

为了更好地体现中国教会的合一,1983年两会出版了《赞美诗(新编)》,共收录400首诗歌,其中300首左右选自不同宗派传统的赞美诗本,100首左右则是中国基督徒作词、谱曲或使用中国曲调的赞美诗,为适应农村教会以及小型聚会的需要,另附有40首短歌。<sup>[21]</sup>

1983年7月出版了体现合一精神的《要道问答》,内含圣经、上帝、基督、圣灵、救恩、教会、圣徒共7章。该书在编写过程中,曾向各地教会广泛征求意见,收到的意见“所代表的原属不同传统之广泛,几乎包括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各个宗派和派别”。编写组按着“我们不是要非议过去的所有宗派而再立一个新宗派,而是竭力继承过去各个不同传统中的最美好部分,荟萃于一”,“可以广涵教会史中各种不同的亮光和领受,彼此充实,互相增长,一同进入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的宗旨进行编写。至于在各原有传统之间存在不同见解的地方,以彼此尊重,求同存异为原则,“尽量将一些不同的译法、看法和做法,并列提出而不强求划一”,“无意要求对任何条目在理解上划一”。<sup>[22]</sup>如神与上帝、受浸与受洗、再来与复临、十条诫命与律法总纲等都并列写出;对于小异,则不列入问答,同时也不互相论断。<sup>[23]</sup>

[19] 顾梦飞:“中国基督教联合礼拜”(未发表)。

[20] 此节参考顾梦飞:“中国基督教联合礼拜”(未发表)。

[21] 曹圣洁:“关于赞美诗编辑工作的发言”,《天风》1983年第2期,第12页。

[22] “《要道问答》编写工作回顾”,《天风》1984年第2期,第16-17页。

[23] 顾梦飞:“中国基督教联合礼拜”(未发表)。

(3)《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的制定和实施,肯定了教会内多元体制并存的状态,为“后宗派时期”中国教会的教规、制度的制订奠定了基础。

联合礼拜后,旧的规章制度不再起作用,新的又没有建立。随着基督徒的大量增加,混乱现象日益滋生,如没有受过洗的人在为别人施洗,自己按立自己为牧师等等。为此,1987年中国教会通过了《关于推进自治,制定教会规章制度的决议》,并成立规章制度委员会。在各地教会制定各自的规章制度的基础上,1991年底中国教会出台了《中国基督教各地教会试行规章制度》,为建立新型教会作出尝试。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基督教协会于1996年12月通过了《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下称《规章》),肯定了教会内多元体制并存的状态,为“后宗派时期”中国教会的教规、制度的制订奠定了基础。该规章强调信仰传统及礼仪上彼此尊重的原则,“彼此接纳,不互相攻击,也不强求统一”。但也明确规定“不单独制定以宗派为名的规章”。<sup>[24]</sup>这一规章体现了中国基督教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之点,例如“圣职”的条文表明,中国教会有主教,但却不是主教制中掌管教区的主教;有长老,但却不是长老制中掌握教会行政大权的长老,一切都是根据中国教会的实际需要而制定,既体现联合精神,又体现不同信仰传统之间的互相尊重。<sup>[25]</sup>此后在此规章的基础上又于2008年和2018年作了修订,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2008年的这次修订是在1998年神学思想建设的基础上进行的。而2018年则是在2011年提出的基督教中国化基础上进行的修订。

2018年12月出台的新的《教会规章》,在六大方面对2008年《规章》作了修订:“坚持基督教中国化方向,要求各地教会在尊重和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教会生活模式,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明确中国教会治理体制,加强基督教两会

[24] 《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中国基督教第六届全国会议专辑,第67页。

[25] 顾梦飞:“中国基督教联合礼拜”(未发表)。



的教会性；促进中国教会从宗派后期走向进一步合一；增强《规章》的可操作性，使各地教会在依法办教和民主办教的过程中有据可依；力求《规章》的规范化，在尊重不同信仰背景教会需求的基础上减少分歧点；强化问题意识，突出问题导向。”<sup>[26]</sup>

这六条修订都与基督教合一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基督教的合一是与中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密切相连的，也就是中国基督教的合一是离不开中国教会的本色化这个前提的，因为中国教会建立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它天然地就与西方宗派主义的教会有所不同。这次《规章》中就这一点而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基督教的联合是与基督教中国化密切相连的，是要建立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的。20世纪本色化运动中不少基督徒也都与当时的社会密切相结合，积极投入“收回教育权运动”、“五卅运动”等爱国行动。这次《规章》中则明确提出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些都是对基督教合一的保障。特别是提出要突出两会的教会性和从宗派后期走向进一步的合一，这点十分重要。这说明当前中国基督教实际上在联合的路上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地走合一之路。

### 三、8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基督教会合一所遭遇的问题

#### (1) 中国教会因是否参加“三自”组织产生的分化

“文革”期间，中国教会的老信徒中很大一部分，特别是大中城市基督徒基本都没有了宗教生活。而像温州、河南农村悄悄发展的教会则无一幸免全部走上了“家庭教会”之路。当时没有正规的组织形式，缺乏牧师，从平信徒中兴起了一批领袖，他们没有宗派意识，却深受信徒的信任。到“文革”后期，一些家庭教会在组织体系上内部出现了某种联合趋势。到80年代初，教会刚公开恢复活动时，中国

---

[26] “新修订的《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已经通过！”，<http://www.ccctspm.org/newsinfo/11262>，2018年12月21日下载。

信徒确实完全打破了宗派观念，合一达到了高峰。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三自”组织的逐渐恢复，教会却开始出现分化。

以温州为例，80年代初，温州苍南一带的教会受“呼喊派”影响很大。1983年温州政府在对“呼喊派”打击之后，于1984年便要求教会一律参加“三自”。这造成了温州教会第一次大分裂。由于温州在“文革”后期已形成一套由教会平信徒组成的同工会管理模式的教会，“三自”恢复活动是在教会复兴之后，但“三自”的堂管会模式又与同工会不一致，所以当三自想要用堂管会模式取代原来同工会模式时，遭到一批信徒的激烈抵制。

那批反对进入“三自”的信徒主要是怕进了三自后受政府管辖，宗教信仰不自由了。再者，他们看到不少“文革”中表现很差的牧师进了三自的领导岗位，这让平信徒接受不了。例如有某牧师，“文革”时就对信仰冷淡，那时天堂山的主要同工被抓了，政府给他们吃猪血，同工们都不吃，但某牧师却吃了两大碗，这被同工们视为不忠于《圣经》的具体表现。因此当恢复三自时看到一批像他那样的人物当“三自”的会长、主席等要职，很多人就不想参加“三自”了。

一些信徒讽刺这些牧师说，“‘文革’时你们都当缩头乌龟，现在看到教会处境好了，你们又出来捞好处了！”温州东边近海的几个县的基督徒抵制得最厉害。那些地区由于绝大多数教会都不进“三自”，教会内部的斗争反而不激烈，只是那些县的家庭教会人数多而已。而有些地区因两派信徒势均力敌，其斗争非常激烈，乐清县是其中之一。一般来说，年纪较大的信徒因经历过历次运动的磨难，所以大多主张参加“三自”，而那些在“文革”中成长的年轻信徒大多反对参加“三自”。这也是日后家庭教会活力普遍超过“三自”教会的原因。在不少地方，两派为了争夺教堂和讲台发生肢体冲突。当时的温州乐清柳市堂就如此，两派打得非常厉害，最后是一批反“三自”的信徒脱离了教会，另外建立了沐恩堂。一位温州牧师告诉笔者，温州教会分裂最严重是在1985-1990年，当时都因此而惊动了宗教局局长任务之和丁光训主教，两人都为此来温州了解教会情况，可见温

州教会分裂的激烈程度之激烈。

某省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以该省某市为例,80年代打击“呼喊派”扩大化,对一些没有参加过“呼喊派”活动的,或者只参加过一两次活动的人都要进行盘查。某地甚至还把所谓“呼喊派”的首领装麻袋游街,大大伤害了信徒感情。因此1984年地方政府要求基层农村组建三自组织时遭到信徒的拒绝,大部分信徒都成为“家庭教会”的成员。

当时是否加入“三自”成为全国各地基督教大分裂的主因。上述两地区只是比较典型而已。

## (2) 近几十年来教会分裂的原因

就“三自”本身而言,近几十年来合一也面临着许多问题。

一是表现在教派意识的增强,特别是小教派,分离倾向越来越强烈。中国教会从联合之时起就提出“存小异”,只要原教派不挂自己教派牌子就行,实际上这种做法收效甚微,因为不仅他们早就自认是这个教派的成员,“大教会”的信徒也都把他们视为那小教派的人。挂不挂牌子对教派观念的强弱不起任何作用。从实际调研看,有些地方为了维持表面上的合一,非要把不同教派放在一个堂礼拜,结果双方矛盾越来越尖锐,我们观察到凡是两个教派合用一堂的几乎没有不起矛盾的,前些年去某市调研,到一个大教会,听到一些信徒说,“原安息日会”的信徒总算搬走了。他们在这里时每周六举行洗脚礼,一盆盆的臭洗脚水搞得礼拜堂地面都是水,臭烘烘的。另一市某堂的安息会与教派之间经常发生摩擦,2017年11月该堂大教会的门卫把安息日会的一位长老打伤。

如今教派问题是一个实际问题,不会因为不挂牌子就不存在了。关键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教派,而是在于各教派间是否相互尊重。大家都在“三自”原则下,各自管理好自己的事工。

二是教会内因权力之争而分裂的现象也非常普遍。这些年来在调研中发现,如今某些教会内部争权夺利,矛盾突出。前些年了解到某市最大的教会,两派牧师为了各自的权力,大打出手,许多信徒流

泪离开。最后宗教局下决心，调派两会力量组成工作组进驻教堂，把两派牧师都靠边，发动信徒群众，花了近一年时间才把此问题解决了。在另一个城市，一派牧师把另一派赶出教堂，被赶出去的这派只能另租地方聚会，成了“家庭教会”，宗教局局长知道后对霸占教堂这派的牧师非常生气，但也无可奈何。这类事件大概全国不少教会都发生过。

三是礼仪纷争造成的分裂，例如因引入赞美会形式，造成教会分裂。有些大教会是由保守的牧师把持，把一批在教会中举行赞美会的青年人赶走，造成教会分裂。那些青年人就在外面自己聚会，成了“家庭教会”。我们在山西和广州了解到，有些“家庭教会”就是这样从“大教会”分出来形成的。

四是“灵恩运动”造成分裂。近年来因“灵恩运动”造成教会的分裂也时有发生。某市一个灵恩派教会就是从“大教会”的青年团契中分出来的。带领青年团契的一位长老接受了灵恩运动的方式，被原教会视为异端，他不得不离开，走的时候有一批青年人跟从他，于是他在外面建立了一个灵恩派教会。

凡此种种，表明中国基督教的合一运动面临着各种挑战。中国基督教的合一将怎么进行，这是放在“两会”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 四、中国三自基督教会合一的前途

从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以来，基督新教教派越分越多。但这并没有影响基督教的发展。反而因教派多，适合各种不同人群的需要，而使基督教总体发展状况超过了天主教。

但在基督教教会史上，因传教需要，基督教各派也会联合起来，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以后来华的传教士中，各差会的联合行动还是比较多的，我们从他们在华多次召开的全国会议就可以看出，参会者包括各个宗派。但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基督教各教派的合一。

### (1) 中国的“三自”组织架构内的教会能否走国际上的联合教会的路?

基督教的合一事工有多种形式,有教派内的合一,有各教派间的合一,有基督教某一事工的合一等等。各教派间的合一也有程度上的差别,有些是几个教派打破教派界线,完全联合为一个教会,如加拿大联合教会是由美以美教会、长老会、公理会、地方联合教会、加拿大福音联合弟兄会等联合组成。联合以后的教会已是真正含义上的教会了,即内部的组织建制、礼仪、神学思想都经过充分协商后达成了基本一致的看法。之所以能达成基本一致的看法是因为这些教派本身都属于公会系统的教派,在神学思想上也基本属于自由派之列,比较容易打破原有的教派界线。

今天中国基督教“三自”组织架构内的教会是否类似于加拿大联合教会这样的教会呢?这要看我们的联合基础与他们是否相似了。

中国基督教合一的基础是什么?根据1982年郑建业主教提出的七条联合原则看,最重要的基础是:都参加“三自”,爱国爱教,各教派在组织上不自成体系,不挂原宗派的牌子,不单独与国外进行活动,不单独印发出版物。这些实际上都是一些外在的东西。而对宗教核心信仰和礼仪则是按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处理,即在持守基督教基本信仰的前提下,各宗派的某些不同理念、信仰观念、礼仪传统等依然保存;也就是组织形式上求同,信仰礼仪上存异。实际上组织形式上也不是真正求同,只是取消了全国性的自上而下的各宗派的组织机构而已,各教派基层的组织架构却都维持原状。这就造成中国基督教会的联合与海外的联合教会有着很大的区别:

作为西方含意上的联合教会,最起码组织建制应该是统一的。例如中国天主教虽然有“地上”和“地下”的区别,但它的建制是一个,都是主教制。中国基督教会是什么建制?它有主教,但不是主教制;它有长老,但不是长老制。更为复杂的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中的“无宗教时期”,各地发展出以义工为主体的各种体制。各地方、各基层堂会中有些是牧师为教会的主要领袖,有些则以长老作教会的

主要领袖，牧师是受聘的，随时有被解雇的可能。还有些教会根本就没有牧师，如聚会处就是如此。这种连教制都统一不了的联合教会能算真正意义上的教会吗？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教会是否能做到统一教制？从教会的现状看，没有这个可能。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力度增加，与海外联系的增多，国内城镇化加速造成大量人口流动，以及“灵恩运动”的影响等等诸多因素，城市教会变得更为多元化，由此各教派意识也明显地增强，特别是小教派，要想真正统一教制几乎不可能。温州教会 80 年代就因为从同工制转为堂会制都引起极大的冲突，以致一批人进入“家庭教会”，如今如要硬性采取统一教制的做法，只能造成更多的人走向“家庭教会”。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教会也无意做这种统一，因为既然是求大同存小异，为什么要去做这种徒劳无益的工作呢？

此外，礼仪的统一也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这点而言，中国教会也根本不可能做到。不仅是因为原有小教派的礼仪事实上从未触动过，就是大教会，近年来，随着与国外联系的增多，有些也把海外颇具宗派特点的礼仪重新引进了中国教会，如有些教会把圣公会高派礼仪引入教会中，所以如今礼仪不是统一的问题，而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

再从中国基督教神学来看，中国基层信徒绝大多数是属于基要派，而自由派神学，则受到中国基层信徒的抵制。中国基督教会至今尚未完全形成自己独特的神学思想体系，而且在短期内也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神学体系。

凡此种种表明，中国基督教现在的这种后宗派模式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联合教会模式。难怪欧美教会人士占主导的世基联信仰与教制委员会认为，中国教会“宗派后”的合一经验，缺乏足够的信仰及神学的理论依据。

(2) 中国的“三自”组织架构内的教会是否类似于基督教联合会(协进会)这样的组织？

基督教合一事工有些是比较松散的，如世界基督教联合会，主

要是世界各地教会进行协调沟通。虽然有些东正教教会参加其间,但主要还是由思想较为开放的基督教各宗派组成,新教的福音派和基要派等较为保守的教派都不参加,安息日会等小教派也没有参加。

今天中国“三自”架构内的基督教会是否类似于新中国成立前的基督教协进会组织?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有些类似,但也有不同之处。首先,今天的两会系统的教会是建立在参加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础上的。由于是以政治考量为基础的,因此反而吸纳到的教派要比过去的基督教协进会多。它不仅包含现代派,还包括福音派和基要派;它不只包括原属大公派的那些教派,如圣公宗、卫斯理宗、长老宗、浸礼宗、公理宗等等(这些教派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前都参加了中华基督教协进会),还包括过去那些不愿参加协进会的保守教派,如1926年退出协进会的内地会,以及从未参加基督教协进会的聚会处、安息日会、真耶稣会这些小教派,还包括一批在“文革”中产生的无宗派教会。由此“三自”组织架构下的教会内容纳的信徒,包含从自由派到基要派各种不同神学思想的人,远较以往的基督教协进会多,只要拥护政府,参加“三自”即可。当然还包括在“三自”的框架下,各教派不要相互攻击,要做到互相尊重。

其次,今天的中国基督教会因为是统一在“三自”的旗帜下,而“三自”又是政府与教会间的桥梁和纽带,因此三自的组织架构下,各地方教会之间的联系比过去的基督教协进会架构下密切。但因三自组织又是属地管理,既然受地方政府宗教局管理,两会本身就无法构成一个像教会那样的自上而下的严密的管理体系,上级两会对下级的两会机构只有指导权,没有处置权,所以又不像是一个真正的西方式的联合教会。

**(3) 中国“三自”架构下基督教会只有走自己独特的合一模式,即两会系统的模式**

目前中国基督教会的管理模式只能称为中国基督教两会的管理模式,它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与其他国家联合教会或世界其他的教会联合会都不相同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也是其他国家难以仿效

的。它是在特定的中国国情下产生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下的教会联合没有达到西方联合教会的程度，但又与外国的教会协会、教会联合会不同，它不是各宗派教会之间的协调机构，而是联合礼拜后各教会的协会，具有某些联合教会的性质。“在某些方面实际上已经发挥联合教会的部分功能。”<sup>[27]</sup>

如今中国教会也意识到要加强两会的教会性。2018年11月底召开的中国基督教第十次代表会议中通过的新修订《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中提出“明确中国教会治理体制，加强基督教两会的教会性，促进中国教会从宗派后期走向进一步合一”，并提出“力求《规章》的规范化，在尊重不同信仰背景教会需求的基础上减少分歧点”。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基督教会坚定不移地沿着两会管理模式这条合一之路前进。

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全国性的中国教会不会走西方联合教会的那种合一模式，也就是说，不可能建成一个垂直系统的全国性教阶制那类统一的教会，因为全国两会并不是全国基督教会的最高权力机构，它只是一个指导性机构。并且根据属地管理的原则，它也不可能成为权力机构。各省市地区的两会机构可以听其建议，也可以不听，因为它们主要是服从当地政府领导。因此中国基督教两会管理主要是以地区为单位，承认地区性差异和某些教派的特殊性，求大同存小异，各堂点在共同承认和接受地方基督教两会领导的基础上，发挥好各堂会的作用。当然这也不排除在一些两会力量强的城市，例如青岛、汕头等地，由两会统管整个城区的各教堂，牧师工资、各堂点的讲道和调动都由两会统派，这些地区的两会颇具有国外联合教会的特色。但中国有许多地区两会力量很小，各基层堂会的力量很强，两会完全起不到一统教会的作用，只能起到把政府的决策上情下达的作用。在这些地区应适当地加强两会的权威性。从整体而言，中国基督教会必须承认地区间的差异，承认不同信仰背景信徒的差异，在这个基础上减

---

[27] 曹圣洁：“中国基督教为加强教会性而努力”，《天风》2005年第1期，第26页。



少分歧点,努力增加其教会性,这就是两会管理模式的中国特色合一模式。在提倡基督教中国化的今天,两会模式在爱国爱教的基础上,还增添了基督教中国化的内容。

近些年来的调研使笔者深刻感受到,基督教两会必须加强教会性。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教会以各宗派为主,它们都有各自一套较为完善的从上至下的管理制度,触犯教规者要受到处置。如今宗派取消,中国教会又没有自上而下的权威性管理模式,因此一些地区的教会或堂会被坏人把持,两会对这些人竟毫无办法。近几十年来,中国教会屡有纷争现象,打着基督教旗号的异端邪教也层出不穷。究其原因,与两会不具有像以往宗派教会的权威性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增加两会的教会性,并由此而增强两会的权威性,对中国基督教的合一非常重要。合一的外在形式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增加教会的凝聚力,使信徒真正认同并维护中国基督教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

总之,中国基督教会开创的中国式的合一模式,即两会的管理模式,无疑对世界基督教合一运动是一个贡献。尽管它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它毕竟使中国大多数宗派和信徒打破教派界线,集合到中国基督教两会旗帜之下,实现了中国基督教会大体上的统一,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中国基督教的合一取得的成果是巨大的。然而,合一进程不会一帆风顺。但笔者相信,只要中国基督教会坚定不移地沿着这一方向前进,定能使教会合一再创辉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